

困蕃之策：中唐名臣李泌的边疆战略

刘海霞

(云南大学 人文学院, 云南 昆明 650091)

摘要: 唐肃宗、代宗、德宗三朝时期, 吐蕃为边疆的首患。谋略家李泌在动荡的局势下提出了使吐蕃“自困”为目的的“困蕃之策”, 对唐朝西北、北部、西南和东南进行了分层级的把握, 迅速扭转了唐蕃战争中唐朝被动挨打的局面, 延缓了中唐的统治, 为宪宗时期的元和中兴奠定了基础。然而“困蕃之策”对西北的把握不足, 经济策略陷入困顿, 对南诏的掠夺倾向认识不够, 策略的成功施行有赖于吐蕃势力衰落的影响, 属于救急的“时政”。

关键词: 李泌; 中唐三朝; 吐蕃; 困蕃之策; 边疆

中图分类号: K242.30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9200(2011)05-0057-05

唐玄宗天宝十四年(755年)安史之乱爆发后, 唐朝由盛转衰, 最大的威胁来自于西部的吐蕃。重臣和谋略家李泌(722~789年)提出了著名的“困蕃之策”, 对迅速改变唐与吐蕃的实力对比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目前对于李泌及其困蕃之策的研究散见于有关中唐民族关系、吐蕃、边疆策略的著述中, 较为集中者为崔明德先生《隋唐民族关系思想史》^①, 该著作从民族关系的角度解析了李泌的思想。然而从唐朝边疆战略角度, 结合李泌史事系统解析困蕃之策的著述尚不多见, 本文试作一尝试。

一、三朝时期的唐蕃战争及其特点

天宝十四年(755年)“安史之乱”爆发后, 唐为了平叛, 从河、陇抽调了大批驻军, 已经强大起来的吐蕃乘虚而入, 与唐争夺陇右、于阗、河西等地, 不断向北部、东部扩展, 使中唐三朝长期遭受战争重创。唐代宗时期吐蕃一度扶植了新的唐朝皇帝, 德宗在吐蕃进攻之下也曾计划逃出长安, 可见吐蕃势力威胁之大。

根据史料记载, 从唐肃宗至德元年(756年)到唐德宗贞元二十一年(805年)短短的50年间, 唐蕃之间发生的见于明确记载的大小战争达69次之多。肃宗时期(756~762年)4次^②: 发生在唐西北的有3次^③, 其中至德元年吐蕃联合南诏夺取唐西北三城; 发生在唐腹心地区的有1次。代宗时期(763~779年)32次: 发生在唐西北的有14次; 唐西部的有3

次; 唐腹心的有12次, 其中广德元年(763年)吐蕃联合吐谷浑、党项、氏、羌二十万军队攻入长安, 广德二年(764年)、永泰元年(765年)仆固怀恩联合回纥、吐谷浑、吐蕃、党项羌、浑、奴刺等进逼长安; 唐西南的有7次, 其中大历十一年(776年)吐蕃联合突厥、吐谷浑、氏、羌二十余万军队进犯西川, 大历十四年(779年)吐蕃联合南诏二十万军队进攻蜀地。德宗时期(780~805年)33次: 发生在唐西北的有10次; 唐西部的有9次, 其中贞元三年(787年)吐蕃联合羌、浑入寇陇州; 唐西南的有14次, 其中贞元五年(789年)唐联合东蛮、两林蛮在嵩州大败吐蕃, 贞元十年(794年)唐联合南诏分头进攻吐蕃, 贞元十五年(799年)唐与南诏共同抵抗吐蕃进犯。

结合相关背景, 由所统计的三朝时期唐蕃战争情况, 不难看出唐蕃之间战事频仍、边界盈缩的变化过程, 也可以看出以吐蕃侵唐为主的唐蕃战争的以下特征:

第一, 唐蕃战争发生地点集中在唐朝边疆地区和京都长安附近, 尤以边疆要地为主, 这导致了唐蕃交界地区疆土的盈缩。吐蕃作战的前期方向多集中在西北和北部, 以及唐朝京都附近, 与唐争夺丝绸之路的军事要地; 后期向东部扩展, 注重控制南方丝绸之路的军事要地。

第二, 吐蕃发动的对唐朝边地的战争, 多在农牧分界区, 以军事占领牧区和寇扰劫掠农区为目的;

收稿日期: 2011-06-06

作者简介: 刘海霞(1980-), 女, 河南睢县人, 云南大学中国边疆学专业2010级博士研究生, 主要从事中国边疆历史研究。

对唐腹心地区的战争,多不以军事占领为目的,更多体现为掠夺物产和人口,之后返回故土。

第三,吐蕃善于役使属部及被控制的民族政权如吐谷浑、党项等,以他们为先锋,争夺与唐接界的地区;也善于联络实力较强的回纥与南诏攻取唐地。唐也在危急的局势下借用回纥、南诏等政权的力量平定内部叛乱和吐蕃寇扰。

第四,唐朝在唐蕃战争中前期处于守势,德宗后期取得主动权后,注重的是与吐蕃争夺丝绸之路和南方丝绸之路的据点。

第五,吐蕃的进攻时间多为春秋冬三季,结合史料来看,唐代宗时期之后也役使被征服的汉人在盛夏入寇,以改变军队人员结构来增强作战能力。唐主动发动的对吐蕃战争却都未深入吐蕃腹地。

二、李泌困蕃之策的提出及施行

在三朝(主要是德宗时期),李泌提出了困蕃之策,体现在以下事件中:

唐德宗兴元元年(784年),唐朝向吐蕃借兵助讨叛乱的朱泚,并许诺事后把安西、北庭之地割让给吐蕃。叛乱平定后,吐蕃来取两地,李泌分析:安西、北庭地区的人骁勇剽悍,控制着西域五十七个政权以及十个姓氏的突厥人,能分散吐蕃之势,不能轻易放弃,况且两节镇的民众竭力为国家坚守边疆近二十年,若交给吐蕃,日后必定会怨恨。吐蕃在征讨叛军的过程中不仅观望还趁火打劫,因而不能割让两地。这个建议终被德宗采纳。^{[1](卷231)}

贞元三年(787年),李泌向唐德宗提出了“北和回纥,南通云南,西结大食、天竺,如此,则吐蕃自困”的策略。李泌分析,回纥自唐肃宗时期一直与唐关系密切,不难争取。南诏是被杨国忠派兵侵扰,才背叛唐朝投向吐蕃,又苦于吐蕃的重税,所以有招抚可能。大食在西域最强盛,与天竺都仰慕中国,又世代与吐蕃有仇,所以可以招抚。^{[1](卷233)}

李泌得知“吐蕃久居原、兰之间,以牛运粮,粮尽,占无所用”的情况,就建议把所藏质地变坏的丝帛重新扎染得花色斑斓,通过党项人卖给吐蕃换取耕牛来帮助边民进行生产,这样能平抑粮价。李泌又建议募集人们交粮换取边疆官位,解决粮食危机。李泌还注意到,甬桥是江淮地区漕运的要冲,不能让官员李纳有机会占领徐州而使朝廷失去江淮地区,应该派官员镇守徐州。这些建议都得到了唐德宗采纳。^{[1](卷232)}

由上,李泌困蕃之策的具体内容为:

1. 以困为主,不深入吐蕃内部,防范吐蕃北上和东进,将吐蕃势力限制在牧区。使吐蕃不能轻易

犯边是困蕃之策的主要目的。

李泌之所以以“吐蕃自困”为目标,显然是从实际出发,认为吐蕃只能防范,短期之内不可能征服。玄宗、肃宗、代宗、德宗时期,吐蕃的彪悍善战始终为中唐所忌惮,即使有郭子仪、李晟、马燧等大将守疆卫土,但纵观三朝五十年,直到困蕃之策全面实施,唐一直没有主动进攻吐蕃的能力,因而“困”是应对吐蕃寇扰的最切合实际的做法。

2. 分化瓦解吐蕃的联合力量,将在唐蕃战争中处于核心地位的两个政权——回纥与南诏作为争取的对象。

这一条是李泌困蕃之策的核心。中唐最强劲的三大边疆政权是吐蕃、回纥、南诏,均与唐地域相接,其中回纥位于唐西北,与唐陇右、河西地区紧邻,若回纥与吐蕃联手,在南北夹攻之下,唐安西、北庭、安北都护府这些丝绸之路上的重要据点无疑不保。南诏位于唐西南,是唐由蜀入天竺(今印度)的南方丝绸之路上的重要据点,又紧邻唐安南都护府,是唐对抗吐蕃南下的牵制力量。回纥、南诏曾在吐蕃的作用下联手,致使肃宗、代宗期间四方乱起。李泌正确分析了回纥、南诏与吐蕃的矛盾,提出了联合二者,切断吐蕃北盟和右臂的策略,这是时局之下的“合纵”。

3. 镇抚安西、北庭以牵制吐蕃北上,避免吐蕃切断唐朝丝绸之路。同时与大食、天竺联合,确保其在唐蕃战争中保持中立或者助唐。

安西、北庭是唐通往大食、吐火罗、天竺等地的丝绸之路上的重要据点,对于保护汉朝以来的传统丝绸之路要道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两地也对牵制吐蕃势力、保卫唐朝边疆意义重大。大食势力较强,因其东南与吐蕃位置相近,与吐蕃存在领地纷争,矛盾积代,天竺情况与大食相似,二者都是可以争取的对象。

4. 经济策略,包括两方面:与党项、吐蕃开展贸易,鼓励屯田,保证边疆地区的经济生产;保证东南的粮食生产和输送渠道畅通,使对吐蕃的军事行动有军备保障。

吐蕃寇边除了抢占军事据点,还有一个重要目的就是劫掠唐朝边疆物产人口,特别是在秋高马肥的季节,这使唐朝边疆的建设与生产受到严重影响。李泌以紧邻的党项做媒介,以旧丝帛换取吐蕃耕牛,补唐朝边地之所需。此外,由李泌倡议而开展的屯田,是有效缓解边疆民众生产生活用度困难的重要举措。李泌加强对东南的控制,保证安史之乱后唐朝的主要粮食供应区,保证了中央用度与边疆“防

秋”即防范吐蕃军事行动的开展。

从贞元四年(788年)至贞元十八年(802年),李泌困蕃之策全面实施。困蕃之策中最重要的是“北和回纥,南通云南”,唐对二者的招抚颇费了一番周折。

唐对回纥的招抚,困难之处并不在回纥,而在唐德宗本人。据《资治通鉴·肃宗下之下》卷220记载,宝应元年(762年)时为雍王的唐德宗在回纥牙帐时,曾受辱于回纥,被强制要求当众拜舞,手下抗争遭鞭笞身亡。此事在德宗心中无异于奇耻深仇。唐德宗之前,回纥与唐友好往来一直是双方关系的主流,也因为回纥的作用,吐蕃不敢轻易犯边。^{[2] [P183]} 德宗意识到吐蕃的威胁更大,但还是不愿与“以水洗血”^④的回纥和好对抗吐蕃。李泌深明德宗的心结,犯言直谏十五次,终于使德宗放下个人恩怨,同意联合回纥。回纥答应向唐称臣、为唐帝之子的五项条件^⑤,表示“昔为兄弟,今媿,半子也。陛下若患西戎,子请以兵除之!”^{[3] [卷217·回鹘传上]} 助唐讨伐吐蕃的愿望十分强烈。

唐招抚南诏的过程则更费周折。南诏处在唐蕃之间,虽然本身受唐扶植才壮大起来,但在受唐扶植之前也曾与吐蕃交好,往往视唐蕃势力强弱开展交往,因而张九龄有“彼不得所即叛来,此不得所即背去”^[4]的判断,而吐蕃也深恨南诏挟唐朝为轻重,责骂南诏为“两头蛮”。^{[3] [卷222上·南蛮传上]} 在唐招抚南诏的过程中,南诏几度犹豫,惧怕吐蕃报复,贞元四年(788年)唐臣韦皋用计离间南诏与吐蕃,使得南诏终于下定决心归唐。“南蛮自嵩州陷没,臣属吐蕃,绝朝贡者二十余年,至是复通。”^{[5] [卷140·韦皋传]} 贞元十年(794年),南诏王异牟寻派五千人奇袭吐蕃,双方战于神川,南诏“攻收吐蕃铁桥已东城垒一十六,擒其王五人,降其民众十万口”^{[5] [卷13·德宗本纪下]},之后接受唐朝所赐“贞元册南诏印”,正式归唐。南诏归唐以后追击吐蕃军至大渡河以北,“吐蕃苦唐、诏犄角,亦不敢图南诏。”^{[3] [卷222上·南蛮传上]}

正如李泌所预测的,大食天竺也与唐联合,与唐成犄角之势,大大限制了吐蕃的活动范围。因李泌建议而在长安西北各军镇开展的屯田,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各边地军镇的粮食需求。德宗贞元八年(792年)之后粮食丰产,陆贽《论守备状》奏述:“诸镇收余,今已向终,分贮军城,用防艰急,纵有寇戎之患,必无乏绝之忧。”此外东南粮运渠道的畅通,也大大缓解了京都用度及边疆军事压力。

三、李泌困蕃之策得失审读

李泌困蕃之策实施的效果,时人韩滉的评论较

为全面:

吐蕃盗有河湟,为日已久。大历已前,中国多难,所以肆其侵轶。臣闻其近岁已来,兵众寢弱,西迫大食之强,北病回纥之众,东有南诏之防,计其分镇之外,战兵在河、陇五六万而已。^{[5] [卷129上·韩滉传]}

可见彼时吐蕃势已日衰。而从唐朝拒绝吐蕃求和的请求看,在唐蕃战争中唐朝已经处于完全主动的地位^⑥。可以说,困蕃之策全面实施的贞元四年(788年)至贞元十八年(802年)是唐蕃战局转折的关键时期。在此之前唐朝一直被动挨打,肃宗时期被吐蕃夺去了西北几处重要堡垒,代宗时期河西、陇右之地完全丧失,京都与西南遭全面洗劫,德宗前期状况也极困窘。困蕃之策全面实施之后,为唐朝国力恢复奠定了良好基础,唐朝终于迎来了宪宗时期的元和中兴。此后至晚唐的懿宗咸通二年(861年),唐在河陇地区的原建置终于全部复置。

贞元十九年(803年)吐蕃遣其臣论颊热入贡,唐遣右龙武大将军薛亾出使吐蕃,^{[1] [卷236]}唐蕃之间开始逐渐恢复友好。然而虽然将吐蕃困守在青藏高原牧区,李泌的策略本身也存在着诸多漏洞。这些漏洞反映在施政的各个方面,暴露出效用的短暂性与偶然性。

首先,困蕃之策对安西、北庭状况的把握不足,造成了两地因回纥而叛唐归蕃的恶果。

在李泌的困蕃之策中,对于丝绸之路上的安西、北庭非常信任,认为他们对唐朝忠心耿耿。然而在贞元六年回鹘(原回纥,788年更名为回鹘)与吐蕃进行的战争中,作为唐朝都护府所在地的北庭没有支持回鹘抗蕃,却乘机投降了吐蕃:

回鹘颉干迦斯与吐蕃战不利,吐蕃急攻北庭。北庭人苦于回鹘诛求,与沙陀酋长朱邪尽忠皆降于吐蕃;节度使杨袭古帅麾下二千人奔西州。^{[1] [卷233]}

由上可知,李泌困蕃之策中的重要因素北庭、安西之地,与回鹘地域相接,回鹘对其征敛无度,双方存在着矛盾冲突,这一状况李泌未充分了解到。

其次,经济策略中,在西北的屯田取得了成效,但在东南较被动,体现出唐朝对东南“粮仓”经营的不力。

中唐对吐蕃作战,军粮等补给作为后备力量,必先安顿妥当才发兵。安史之乱后,由于中原经济遭到了大规模破坏,关中和其他腹心地区的粮食供应远远无法达到军事需要,东南江淮地区成为唐朝的“粮仓”,压力巨大。而唐德宗对掌管粮仓的官员无故怀疑,也对东南贡粮的积极性造成了挫伤。韩滉虽赖李泌全力保护而得以摆脱怀疑,使东南粮道

畅通^⑦，但其他地区还是难以尽从唐朝统治。联系前述李泌建议分散李纳的力量之事，可以看出中唐对江淮地区的官员也缺乏有效制约。

再次，对回纥经济掠夺的处理较好，但对南诏顺服外表下的掠夺倾向理解不够。

回纥对唐的经济掠夺给唐朝造成了沉重的负担。如肃宗时期，回纥“自乾元后，益贪功，每纳一马，取直四十缗，岁以数万求售。”^{[3]（卷217上·回鹘传上）}故而李泌在联合回纥时就提出了五项限制回纥的条件。然而对于南诏，从困蕃之策的内容来看，唐对其掠夺的倾向缺乏必要的防范。

南诏以获利为准则的战略选择明显。对于南诏的掠夺，方铁先生有如下分析“南诏与唐的合作虽呈现喜人的局面，唐廷及有关官吏仍未接受此前的教训，未考虑合作局面可能再度破裂，因而缺少必要的警惕。”^[6]南诏主异牟寻死后，南诏对唐地的掠夺变本加厉：自咸通以来，南诏两陷安南、邕州（治今广西南宁），一破黔中（治今重庆彭水），四盗西川（在今四川），天下骚动，十有五年，其间租赋大半不入京师，朝廷内库亦显虚竭。^{[3]（卷222中·南蛮传中）}南诏的多次掠夺，加剧了唐朝衰亡，故《新唐书》云“及其亡也，以南诏。”^{[3]（卷222下·南蛮传下）}

第四，必须认识到，吐蕃衰落的主要原因并不是李泌困蕃之策的实施，只能说困蕃之策找准了吐蕃衰落的时机，巧妙利用了存在于吐蕃周边的种种矛盾，其成功施行具有偶然性。

虽然李泌的策略取得了非常重大的成效，但策略本身的全面施行，却是以吐蕃衰落作为前提的。贞元十三年（797年），吐蕃首领桦松德赞死后，吐蕃爆发了内乱，导致了王朝体系的逐步瓦解，军事实力衰落。关于吐蕃衰落的原因，张云先生有如是分析：吐蕃王朝有其致命的弱点，它过度依赖军事的实力，过度追求直接掠夺物质财富，因此除了西域地区（主要是今新疆的南疆地区）之外，在其他所控制的地区大多不能持久。争霸强国的努力只能膨胀一时，却无法称雄一世。^[7]这一分析是有道理的。从大方向来讲，吐蕃衰落的主要原因并不是唐朝的政策，不是李泌困蕃之策的“果”，而是困蕃之策得以施行之“因”。

第五，李泌的困蕃之策，是在特殊背景下，拥有特殊地位的臣子的智慧纵横，属于微观的策略，在积弊日深的三朝时代，其效果虽及时但并不持久，与李泌“时臣”的身份类似，属于“时政”。

如前所述，困蕃之策的出发点就是“困”，是斩其羽翼、缚其手足，困守在原居地。联合回纥能够

成功，是由于李泌作为三朝元老，与肃宗、代宗“亦师亦友”的特殊密切关系，不会招致德宗的猜忌；南诏方面，处事灵活、深明李泌困蕃之策本意的西南大将韦皋进行了巧妙周旋，才使得南诏最终叛蕃归唐。困蕃之策中的这些重要步骤，是在正确且巧妙把握时局的基础上得以实现的，并不能达到长期效果。在这一点上，崔明德先生将同样作为宰相的陆贽的边疆民族思想^⑧与李泌做了对比，指出：“陆贽的民族关系思想博大精深，具有完整的理论体系，熔批判性、建设性和可行性于一炉，但由于其批判性太强，涉及面太宽，不太容易被帝王所接受，因而难以在实践中发挥它的指导作用。李泌的民族关系思想非常现实，照顾到了方方面面，易于为各方所接受，因而最有成效。”^{[2]（P303-304）}马勇先生分析“对于这时的唐廷来说，当务之急是防御吐蕃的进犯……以致为此不惜一切代价。因此，陆贽的建议不为德宗采纳也就在情理之中了。”^[9]

李泌的困蕃之策虽没有最终改变唐王朝的颓势，却尽力保持了唐王朝的稳定，延缓了唐朝的衰亡。王夫之《读通鉴论》对李泌有着较高的评价，说他“制治于未乱，保邦于未危，乃可以为天子之大臣……李长源当之矣。”^{[10]（卷二三·肃宗四）}然而客观来讲，终李泌一生，都是在想方设法控制唐朝边疆局势，对边疆地区各政权的内外境况、边疆民众的生存状况关注较少，困蕃之策也只是切合当朝当时的正确方式。

注 释：

- ① 崔明德、马晓丽《隋唐民族关系思想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204—206页。大致相同的分析见崔明德先生的另一著作《隋唐民族关系探索》第291—294页。崔明德《隋唐民族关系探索》，青岛：青岛海洋大学出版社，1994年。
- ② 战争总数的统计资料主要来源为两唐书和《资治通鉴》，按照战争发生与结束的具体情况界定次数，吐蕃对唐朝在同一年不同月份发动的进攻，若战争地点不同又不是一次军事行动的统一指挥，视为两次；若同一方位且与其他月份的战事联系密切，则视为一次战争。
- ③ 这里按照唐朝西北、西部、腹心、西南分别计量次数，有的战争同时在几个地区发生，由于统一部署，实际上属于一次战争。也因此，各地区战争的次数总和不等同于各朝战争总数的统计。
- ④ 建中三年（782）唐朝将领张光晟杀了回纥的突董等人，唐德宗以为回纥会打击报复，就准备好了与回纥绝交。而回纥可汗顶着民众仇恨的压力释放了唐使，不愿意“以血洗血”，希望能“以水洗血”，主动向唐示好，这本是恢复交往的机会，唐朝却只是“以帛十万匹、金银十万两偿其

马直”。事见《旧唐书》卷一二七《源休列传》。

- ⑤ 唐朝向回纥提出的五项条件为：称臣，为唐帝之子，每次遣使不超过二百人，运马不过千匹，无得携唐人及胡商出塞。见《资治通鉴》卷二二三，贞元三年。
- ⑥ 吐蕃遣使请寻盟，吉甫议：“德宗初，未得南诏，故与吐蕃盟。自异牟寻归国，吐蕃不敢犯塞，诚许盟，则南诏怨望，边隙日生。”帝辞其使。事见《新唐书》卷一四六《李栖筠传》。
- ⑦ 兴元元年（784），有谣传称镇抚江东的大臣韩滉有谋反意图，唐德宗生疑，李泌以全族百余人的性命作保，坚信韩滉无罪，并分析说，今年遭旱灾、蝗灾，关中地区严重缺粮，江东丰稔，若听信谣言怀疑韩滉，朝廷就会发生粮荒。德宗按照李泌的意见，安抚韩滉，韩滉立即发米百万斛，令其子冒风涛送到长安。之后江南的陈少游听说韩滉贡米，也上贡二十万斛。事见《资治通鉴》卷二三一，兴元元年。
- ⑧ 陆贽认为唐防御吐蕃的措施存在六大问题：措置乖方、课责亏度、财匮于兵众、力分于将多、怨生于不均、机失于遥制，提出了一系列长远解决吐蕃问题的建议，但是并未得到采纳，事见《旧唐书》卷一三九《陆贽列传》。

参考文献：

- [1] (北宋)司马光. 资治通鉴[M]. 北京: 中华书局点校本, 1956.
- [2] 崔明德. 隋唐民族关系探索[M]. 青岛: 青岛海洋大学出版社, 1994.
- [3] (北宋)欧阳修等. 新唐书[M]. 北京: 中华书局点校本, 1975.
- [4] (唐)张九龄. 敕吐蕃赞普书[A]. 全唐文卷二八七[Z].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7.
- [5] (后晋)刘昫. 旧唐书[M]. 北京: 中华书局点校本, 1975.
- [6] 方铁. 云南地缘政治关系变迁[J]. 待刊稿.
- [7] 张云. 吐蕃王朝扩张策略之分析[J]. 中国藏学, 2007, (2): 24-32.
- [8] 崔明德. 隋唐民族关系思想史[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0.
- [9] 马勇. 唐德宗朝在长安西北地区的御边措施[J]. 云南民族大学学报, 2007, (4): 109-112.
- [10] (清)王夫之. 读通鉴论(下)[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4.

The Strategy to Control Tubo: The Famous Feudal Official Limi's Borderland Tactics in the Middle of the Tang Dynasty

LIU Hai-xia

(College of Humanities , Yunnan University , Kunming 650091 , China)

Abstract: Tubo was the greatest threat in Tang Suzong , Daizong and Dezong periods. Limi , as a politician , put forward the strategy to control Tibet , which aimed at self-trap. The central power controlled the northwest , north , southwest and southeast areas of Tang from different levels , which reversed Tang's situation of being hit in Tang-Tibet wars rapidly , prolonged the domination of Tang , and laid a good foundation for YuanHe revival in Tang Xianzong period. However , the strategy to control Tibet had a defect of consideration for northwest area , and the economy tactics failed to execute effectively. Nanzhao's plunder was not taken into account and the successful implement of the strategy rested on Tibet's decay. Thus the strategy to control Tubo was only a policy just meeting an urgent need.

Key words: Limi; three periods in the middle of the Tang dynasty; Tubo; the strategy to control Tibet; frontier
(责任编辑 杨永福)